

考试大整理城市发展史讲义（九）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[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\\_ti2020/168/2021\\_2022\\_\\_E8\\_80\\_83\\_E8\\_AF\\_95\\_E5\\_A4\\_A7\\_E6\\_c61\\_168151.htm](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68/2021_2022__E8_80_83_E8_AF_95_E5_A4_A7_E6_c61_168151.htm)

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 — 为了强化控制，战国时期的城市产生了封闭的市场和坊里，经汉代的推广，封闭的市坊制度在全国沿用下来，迄隋唐之际发展到完备，城市商业活动及居民日常行为均受到其严格的管束。然而市坊制度在它发展到高峰的时刻却随即开始了衰落，中唐以后，长安的坊市已经不能约束商业活动了。唐代宗时，人们就无视坊市的规定，“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、接檐造舍等”[1]。文宗时，长安的坊门出现了“或鼓未动即先开，或夜已深犹未闭”，武宗即位时，敕“京夜市，宜令禁断”[2]，却未能奏效。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于长安商业活动的兴旺。当时的长安不仅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，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，内外经济、文化交流十分频繁，人口众多，仅有的东、西两市不敷商业活动的需要。所以早在唐中宗时，长安及洛阳两京诸市已往往在正铺之外更造偏铺，景龙元年（707年）虽下令禁止，未果。由于长安东西两市周围的坊中有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居住，所以他们的经营活动逐渐渗透到这些地方。东市西北靠近皇城的崇仁坊，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，故多修造乐器的商店，“昼夜喧呼，灯火不绝”[3]。平康坊是有名的烟花妓所，里边有“小铺席”出卖“草锉姜果之类”[4]。另外，延寿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银珠宝的（《唐阙史》卷下，王居士神丹条）；颁政坊有馄饨曲，长兴坊有饮𠵿毕𠵿罗店，𠵿毕𠵿罗是胡人所食馒头的一种（《酉阳杂俎续集》卷一）；宣阳坊有彩

纈铺（《北里志》“王团儿”条）；胜业坊有卖蒸饼的“以小车载蒸饼卖之”（《朝野僉载》卷五）；永昌坊有茶肆，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，新昌坊有客舍及“会饮”的“饮所”，升平坊里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（《全唐文》卷七二七《养狸述》及沈既济《任氏传》）；道政坊，常乐坊有酿酒店，宣平坊夜间有“卖油者张帽驮桶”（《酉阳杂俎前集》卷一五）；西市东南的兴化坊有“以贩缁为业”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八六《无双传》）；西市西南的怀德坊中，住有富商邹风炽“四方物尽为所收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九五引《西京记》）；丰邑坊“多假赁方相送丧之具”（《两京新记》卷三）。在东都洛阳，修善坊有酒肆、车坊（《元河南志》卷一），清化坊和殖业坊均有沽酒店（《朝野僉载》卷一、卷五）。武则天时，已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，李峤表文称：“坊为要冲，地当贵里，亩赁二三十贯，……夺其近市之门闾，生其破家之怨”[5]。德宗时，敕诏“坊市之内，置邸铺贩鬻”[6]，予以了认可。坊市制度，几近驰坏。唐文宗大和五年（831年），左右巡使抱怨，有太多的居民不守规定，实际上已无法阻止了。二类似情况在全国很多城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，经济发达的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其中扬州比较突出。德宗兴元元年（784年）杜亚任淮南节度使时，扬州城中“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，行旅拥弊”[7]，较早地形成了街市。唐人诗中有不少赞颂扬州街市繁盛的句子，如张祜《纵游淮南》：“十里长街市井连”；韦应物《广陵遇孟九云卿》：“华馆十里连”；杜牧《赠别》：“春风十里扬州路”等。其实，诗人们吟颂的十里长街是指扬州罗城中最为繁盛的一条街市，准确的长度应为九里三十步，日夜

喧腾，盛况可观。至于汴州临街设店，坊市制度遭受冲击当不晚于隋。大运河开通后，紧临汴州的汴河西通东都洛阳，南达江淮富庶之地，是南来北往必经之水路，汴州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交通枢纽，八方辐辏，商业发展堪与扬州匹论。开皇中，隋文帝东封泰山回京，路过汴州时，“恶其殷盛，多有奸侠”，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，“禁游食，抑工商、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，船客停于郭外，星居者勒为聚落、侨人逐令归本，其有滞狱，并决遣之，令行禁止，称为良吏”[8]。这里“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”和“星居者勒为聚落”显然是整顿加强市坊制度的举措。看来之前情况已经相当严重，所以才引起皇帝的不满，令狐熙因治理得力被“称为良吏”。汴州市坊第二次受冲亦当在中唐前后开始。起先，很可能同样基于“恶其殷盛”的原因，隋炀帝于大业二年（606年）将汴州撤消，改隶郑州，降低了其政治地位。唐武德四年（621年）恢复，但仅为普通大州。安史之乱到兴元元年之间，汴州成为各地军阀争夺角逐的重要对象，唐王朝几经得失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发展。直到兴元元年宣武军移到这里，唐王朝以十万大军镇守于此，汴州才安定下来，重又成为黄淮之间一个军事重镇和地区性行政中心，人口大增，深感“汴州城隘”，于是广之。这次修城又称“筑罗城”，就是修筑外城，从建中二年（781年），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始，规模相当大，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，以至引起诸藩镇的惶恐不安，“东方人讹言：上欲东封，故城汴州。（李）正己惧，发兵万人屯曹州；田悦亦完聚为备，与梁崇仪、李维岳遥相应助，河南士民骚然惊骇”[9]。可见这次修城的反响之大，也足见汴州此时的崛起。进入中

唐，与扬州相比，汴州因为“王室藩屏”[10]，监控关东藩镇，守护长安，因而在军事上更为重要。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，二者则有极为相似之处：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所在地，汴州为宣武军节度使所在地；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割据，黄河以北及山东，河南等地的赋税均被当地节度使留用，唐政府所需财物十之七八仰仗江淮，扬州为东南水陆交通枢纽，东南各道物资多集中于此然后北运，汴州因居漕运咽喉要地，代宗广德二年（764年）刘晏改革漕运后，江、汴、河、渭分段运输粮食，除粮纲经过汴州外，又规定“轻货自扬子至汴州”[11]，使汴州成了钱、帛等物的中转站，建中三年，又在汴州东、西设两个水陆发运盐铁租庸使，这样，汴州与扬州一道，是唐王朝生命线的两个重要支点。二者同时发展成为运河沿线上最为突出的两个经济都会。至唐末，北部中国战乱不休，民穷财尽，城市凋弊，长安、洛阳今非昔比，汴州是北方少有的闪光点。经济发展必然招致人口激增。按天宝七年（748年）算，整个扬州地区有七万七千一百五十户，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七口，较初唐增加三倍还多[12]。按理，城市人口增加更快。特别是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安史之乱后，北人大批南下，扬州城人满为患。《新唐书五行志》记载文宗大和八年（834年）三月，扬州城区大火，烧毁民房千区，十月，又遭大火，烧毁民房数千区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居住密度之高。今人推测，当时扬州城市人口（包括市内和郊区）约十九万，城区人口可达十多万人[13]。汴州时领县六个，人口约五十八万，城市人口若占四分之一，则将近十五万人。再加上“大军十万”驻扎，人口压力当比扬州为大。同扬州一样，汴州也为四方人士趋

之若鹜之地，刘宽夫谓之“当四会五达之通，杂燕赵悲歌之人，迩吴楚剽轻之俗”[14]，流动与侨居人口相当之多。比较城区大小，扬州城周遭在三十五里以上，汴州城“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”，明显小很多。据此，汴州城中密度肯定要高于扬州。人口过密，居住混乱，城市秩序已很难控制。当时的汴州“邑居庞杂，号为难治”[15]。封闭的市坊制度根本无法维系，居民侵街现象非常严重，到后周世宗修展东京时，已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九二“后周显德二年十一月”条曰：先是大梁城中（按指唐时修筑的里城）民侵街衢为舍，通大车者盖寡，上命悉直而广之，广者至三十步，又迁坟墓于标外。上曰：近广京城，于存歿（mò）扰动诚多，怨谤之语，朕自当之，他日终为人利。可见，普遍的侵街占道，能通大车的街道都不多了，强行拆迁，才能拉直开阔。“于存歿扰动诚多”，表明涉及到一大批人，阻力很大。不得已，知开封府王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手段强制执行，曾当街杖死一名工作“驰慢”又不服责备的厢校[16]。即便如此，还只是部分拆迁，略为把街道拉直开阔，不可能全部拆除。柴荣勇于承担“怨谤之语”，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必要性：鞞（niàngū）之下，谓之诰穰，万国骏奔，四方繁会。此地比为藩翰（藩，屏障。翰，通“干”。栋梁），近建京都，人物喧阗（tián），闾巷隘狭。雨雪则有泥泞之患，风旱则多火烛之忧，每遇炎蒸，易生疫疾。近者广开都邑、展引街坊，虽然暂劳，久成大利。[17]这种种混乱的局面，应该说是自中唐开始蓄积，而后在唐亡宋立，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中爆发，城市无暇治理的结果，而至少在唐亡之前，已大体形成了。三 侵街这样严重

，坊墙肯定破坏不堪。市场也不再受局限，开始在有利的地点滋生。城外的草市是一方面，再从王建诗句“水门向晚茶商闹，桥市通宵酒客行”[18]看，汴河东、西水门和沿河桥头都是热闹的市易之所。这里所说的汴河东、西水门是指唐宪宗贞元十四年（798年），宰相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期间修建的汴州城东西水门，也就是北宋时东京里城的汴河水门。汴河在汴州城内由东而西蜿蜒而过，这些市所即使不连为一体，也会在沿河方向或垂直于河的部分街道上，表现出片断的街市形式。后周世宗柴荣面对市坊驰坏，侵街严重的现实，虽以强硬的手段予以整治，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，承认居民面街而居合法化。因此在扩展街道时，“其京城内，街道阔五十步者，许两边人户，各于五步内，取便种树掘井，修盖凉棚，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，各与三步，其次有差”[19]。现代学者认为，这种沿街住户当然是当街开门的，就是在门的两侧种树、掘井和修盖凉棚，这显然是一种新创的街道制度，是适应里城街道上已经出现的具体情况的顺水推舟之作。坊墙，至少是主要街道的坊墙已不复存在了，而且两边各让出街道宽度的十分之一，调动居民种树、掘井、修盖凉棚，一方面美化街景，另一方面以此防止再发生侵街的行为[20]。在新修的外城中，索性不再象隋唐长安那样先筑好“坊”和“市”的围墙，然后把住宅造于“坊”中和商店造于“市”中，而只是放好街巷红线，划定一些特殊建筑的地段，即听任百姓随便营造。这就是显德二年四月柴荣下令别筑新城时诏书中所说的“其标识内，候官中劈画，定军营、街巷、仓场、诸司公廨院，务了，即任百姓营造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九二在叙述这一诏书时也说：

“其标内，俟（si）县官分画街衢、仓场、营廨之外，听民随便筑室”。随后，又许居民临街开店起楼。这是显德五年大浚汴口之后的事，目的有两个，一是增加接待客商的邸店，接待大批涌入的商货，以适应众多居民的生活需要；二是增加都会的壮观。沿汴河如此，沿街道当然也可照此办理，大将军周景威在宋门内率先所造的十三楼就是南临河，北面街。《梦梁录》卷一六《酒肆》在解释酒楼前排设红绿杈子，挂柅（zhi）子灯习俗时说：“如酒肆门首，排设杈子及柅子灯等，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，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，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”。杈子原来是官衙前用来限制行人的设施，红绿杈子是设在宫城的正门前以限制行人的，这些茶楼酒肆该是临街开设，为欢迎皇帝游幸，于门首街前如此装饰，否则没有这样的必要，而且也不可能被允许。经过这样的变化，后周东京实质上已经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“街巷”格局了。当时“街巷”这个名词已经很流行，曾任后周右仆射的王溥，写成于北宋初年的《五代会要》卷二六就有“街巷”条目。街巷上有临街店肆。按日本学者梅原郁的观点，这是唐宋街道变化的第一个阶段：从坊内店肆到临街店肆，时间是从唐中期到宋初[21]。我们认为，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市坊制度从松懈到濒于解体的阶段，为以后北宋时期在制度上街巷完全取代市坊奠定了基础。北宋东京开封北宋（公元960年~1127年），赵匡胤所建。“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”，夺取政权。“杯酒释兵权”，强化中央集权制度。有宋一代是中国文化史的颠峰时代。陈寅恪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

### 1. 宋都开封的原因

#### 1.1. 关中的衰落与南方的崛起

经过多年的垦拓，地

力衰减，加上战乱，关中凋敝。而南方此时开始繁荣。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，出现了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现象。关中作为政治中心要接受经济中心的支持，其最大的问题漕运的艰难。特别是经过黄河的三门之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运到长安的粮食已是“一粒粮食，一粒金”。在为了便于统治全国，政治中心不便南移的情况下，接受南方给养的便利性已是选择都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。五代。后梁开国皇帝朱晃定都汴洲。一方面因为这里是他的发家之地，另一方面正充分利用了此时汴州有利的经济地位。与此相反的是后唐李存勖(xu)。他以唐室后裔自居，故在灭后梁后，迁都洛阳。但由于赋税来源的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，一旦离开漕运便难以为继，因此后唐洛阳常闹粮荒，终于引起兵变。后晋时，汲取了后唐的教训，又将国都迁回汴州，改名东京。石敬瑭天福二年（938年）有诏曰：“为国之规，在于敏政；建都之法，务要利民。……当数朝战伐之余，是兆庶残伤之后，车徒既广，帑廩咸虚。经年之挽粟飞刍，继日而劳民动众，常烦漕运，不给供须。今汴州水陆要冲，山河形势，乃万庾千箱之地，是四通八达之郊。爰自按巡，益观察便，俾升都邑，以利兵民。汴州宜升为东京，置开封府”。这不仅是后唐，而且是后汉、后周，乃至北宋建都东京的真实原因。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在诏书中说：“浚都（东京）重地，汴水名区，控襟带于八方，便梯航于万国。眷言王气，允称皇居。其汴州宜仍旧为东京”。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（955年）颁诏修城时也谈到东京优越的地理位置：“东京华夷辐辏，水陆会通，……” 1.2. 开封的发展 北宋定都东京开封，是中国都城由西向东历史性的转移。这次转移的重大变化



之一是地理环境的变化。在军事地理十分不利的情况下，东京完全是凭借其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成为北宋的都城，也就是其“天下漕运中心”的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开封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漕运体系的发展建设史。早在两千七百年前，春秋时的郑庄公筑城，取“开拓封疆”之意，故名开封。开封漕运体系的形成过程时断时续且十分漫长，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：第一，战国时梁惠王开鸿沟；第二，隋炀帝开大运河；第三，五代至北宋的疏浚整理。如此之后，形成了发达的水路运输体系，使开封成为“天下之枢”。相应地，这也是开封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。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[www.100test.com](http://www.100test.com)